

骗局，致使日军更加疯狂地屠杀南京军民，屠杀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他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1938年5月，他转任中国驻屯宪兵司令官。1939年9月4日转任第十师团长。1942年因病被编入预备役，担任伪治安部嘱托，住大连。1945年日军失败前夕，佐佐木到一又披挂上阵，任日军第一四九师团长，驻扎齐齐哈尔。8月18日，他被苏军捕获，关押于苏联“四五”拘留所。1950年，被引渡我国。1955年5月30日，因患脑溢血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结束其罪恶的一生。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伪军事部藤田顾问的两件事

肖玉琛①

残杀无辜军官

1944年春，为核对第五军管区第八旅的人事问题，我带着日系人事课员东义量少校来到赤峰县八旅司令部。

在我到赤峰之前，曾阅读过八旅上报军事部的一份呈文：去年冬天，八旅一营在赤峰以西25公里的山地遭到八路军伏击，损失200余人，大部分被敌方俘虏。其中有两名少尉排长被释放回来，等待处理。

宋旅长说：“赵排长和王排长都是军校毕业生，今年不到24岁，前途无量。他们被俘后能逃回原部，说明他们是效忠天皇

① 肖玉琛当时任伪军事部人事课长。此文总标题与分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的。”可主任顾问江岛断定他俩是被八路军赤化以后，派遣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必须处死。宋旅长带着恳求的口吻说：“希望肖课长施展你的影响，把他俩送军法会审，最多判两三年徒刑，就是无罪释放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将他们处死，这对部队声誉和安定军心，都是很不利的……”

“我同意把这两个排长移交五军军法会审处理。”东义量说：“不经过审讯，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呢？”

“东义量课员说得极是！”我说，“我们一块要求江岛主任顾问把两个排长送五军军法会审，请宋旅长放心。”在宋旅长同意下，我们会见了两位青年排长。

我首先问题排长：

“你原籍在……”

“沈阳。”

“多大岁数？”

“23岁。”

“家里有什么人？”

“母亲和一个15岁的妹妹。”

我也问过那位王排长：辽阳人，父母都在，兄弟2人，他是长子。

随后，他们俩人详细叙述了被俘的经过：

在第一天的扫荡中，一营没有发现八路军。第二天早6点尖兵回来报告，在101高地发现有服装不整齐的部队在活动。营长立即命令一连进攻101高地，结果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全连覆灭。连长和一名日军军官都中弹身亡。王排长隐蔽在一棵大树下射击被俘。一营长又命令第二连向101高地发起强攻，遭到了同样的失败。赵排长腿部受伤后躲在一凹地，被打扫战场的八路军俘获。

我说：“那么，老老实实谈谈你俩被俘后的情况吧。”

赵排长说：“共产党把我们被俘人员集中在一起，不但没有打骂我们，还给我包扎了伤口。我们吃的和他们的官兵一样。俘虏营的负责人说：‘愿意参军的可以留下，要求回家的可以释放。’我们考虑之后就申请释放了。”

我问：“共产党没有向你们进行赤化教育，让你们做反正工作吗？”

赵排长说：“他们的确向我们进行了爱国教育，但没有教我们做反正工作。只是叫我们回来以后，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回家，还要到部队来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被俘回来的人要受到法律处分吗？”

赵答：“因为我们都有父母家小，如果不回部队，私自回家，将来被官方查出，不仅本人要受处分，家人也得受株连。”

王补充说：“我们考虑过，国法对俘虏总不会有死罪。就是判两年刑，还可以释放回家尽人子之道啊！”

我和东义量都认为这两位青年军官所谈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们决心为他们的生命安全出力。

第二天，我和东义量正想告别宋旅长前往五军管区，在旅司令部门口碰上了主任顾问江岛太佐。我原以为他有重要人事问题专程来赤峰跟我商量，不料他刚一进门就对宋旅长说：

“据了解，一营两名被俘青年军官已被赤化，共产党放他们回来是进行反正工作的，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就会后患无穷！不知宋旅长意见如何？”

“这个问题……”宋旅长尴尬地说：“请主任顾问容我慎重考虑……”

江岛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就匆匆地到教官室去了。

顾问走后，宋旅长苦笑着对我说：“看来主任顾问是特地来处决两名排长的。希望你以人事课长的地位，跟顾问讲讲情，救一救这两个青年人的性命……”

我和东义量决定去找江岛。

当我们走进教育室的时候，江岛正开怀痛饮。我俩向他问过午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名青年军官的事。

“主任顾问，听你说，那两个被俘过的青年军官已经赤化了？”

“是的。”

“是共产党派回来做反正工作的？”

“是的。”

“顾问有可靠的根据吗？”

“有！”江岛神色不快地反问：“肖课长，你问这干什么？”

“这是我份内的事。”我说：“人事课长了解一下军官的罪行有错吗？”江岛挥舞着拳头说：“他们是军官学校毕业的，课长你也知道，我们军官学校里就有共产党分子。”他把话又岔一边去了，显然在胡搅蛮缠。

我说：“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但决不能以此认定这两名青年军官已经被赤化了。我们杀掉他们容易，但要考虑部队舆论和宋旅长的处境……”

东义量补充说：“课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应该把这两个人送交军法会审处理，顾问也少了很多麻烦。”

我向江岛说明：“我们和主任顾问并不是争论权力范围，而是考虑不按军法办事，顾问的威信将受到影响，万一最高顾问怪罪下来，我们大家都不好交待……”

听了这些话，江岛举起酒杯，满面堆笑地说：

“谢谢二位的关心，我敬你们一杯！”

最后，江岛同意把两个被俘归队的排长交军法会审处理。我和东义量高兴地把商谈结果转告了宋旅长，于当天乘车回到长春。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忽然接到五军管区发来的一纸电报说，八旅的两名青年军官“畏罪自杀”了。这两个青年军官是决不会自杀的，显然是江岛私自处决的。他根本没把我这个人事课长放在眼里……我拿着电报向人事顾问藤田作了汇报，并请求派人调查两个排长自杀的真象。人事顾问藤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随即派东义量和另一名中国课员赴热河赤峰执行调查任务。

经过10余天的调查，两个排长死亡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东义量离开赤峰的第二天，江岛把赵、王两名排长押到教官座，用谎言巧语让他们承认是共产党派同来做反正工作的。他们拒不承认；江岛就用极刑逼供，但两个青年军官宁死不招；最后江岛竟用暴力将毒酒灌下，然后把二人的指纹按在事先准备好的供词上——两条青年军官就这样惨遭杀害了。

我把调查报告分别送呈人事顾问和最高顾问阅读，他俩假惺惺地埋怨江岛做法“不当”，行为“恶劣”，将给予“适当处分”。

后来我才知道，江岛杀害两名青年军官，是经过最高顾问和人事顾问批准的。可见，伪满洲国的一切权力和法律都操纵在关东军少数法西斯分子的手里；而我这个人事课长不过是摆在桌子上的一张小小的麻将牌，在我的背后才是玩弄我的真正主人。

对奴才的笼络

1944年9月，在美英等国“盟军”东移太平洋战场的同时，

苏联红军也秘密增防东部边境。日本关东军虽然把大部分兵力调集到中苏边境，但仍不足以阻拦强大的苏军。日本当局为了弥补兵员不足，决定将“红袖头军”改编为一个甲种师——靖安第一师，作为日军一翼，负责守卫东部饶河国境。

“红袖头军”是由一个名叫藤井的日本浪人发起组建的。藤井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由于“品行恶劣”，被开除军籍后落为浪人。九·一八事变，藤井流亡到中国东北，与日关东军和汉奸走狗往来勾结。在日本法西斯分子支持下，他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因为藤井规定这支特殊的部队穿灰色军装，包红布袖头，所以人们就叫它“红袖头军”。

1935年秋，“红袖头军”驻防热河和察哈尔边境。一天，当部队首领藤井站在一个高地上，用望远镜观测国民党汤慕伯部的前沿阵地时，一名士兵突然举起手枪向藤井连射三枪（未中）。当这个士兵被捕后，藤井问他为什么要行刺；这个士兵毫不惧色地说：“你是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一谋刺事件，使日本法西斯心目中的这支“能征善战”的“红袖头军”身价大跌。这次日本当局决定重新启用“红袖头军”，自然要进行一番全面的“整肃”。为了防止军队哗变和再次出现行刺事件，把该军的大部分中国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换成日系军官；留用的中国军官也必须是受过教化教育的军校毕业生；士兵则要求过去在讨伐中出过力的、有作战经验的中等毕业生。同时新派一个叫山崎积的任师长。

山崎积：四方脸，络腮胡，长着一副富有漫画色彩的武士道的脸谱。日本当局声称派这个凶煞神来当师长，是为了使“红袖头军”能够与军纪森严的“盟军”——关东军，并肩相处而不逊色。以“阎罗王”著称的山崎积少将当然也不想使他的上司失望，经他“整肃”过的靖安第一师已完全失去了“红袖

头军”的本来面目，用山崎积的话来说：“我的靖安第一师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富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部队。”特别是靖安第一师，受到国境第一线指挥官奖励之后，山崎更加感到无比荣耀，当即向军事部和最高顾问作了汇报。

1944年秋，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最高顾问楠本为慰问靖安一师的功勋，带领随员十几人来到佳木斯第七军区司令部。他们听取了军区司令赫慕侠的口头汇报后，于第二天一早，在赫司令官陪同下，由一个连的武装护卫，驱车前往饶河县东平顶山靖安一师驻地。大臣和最高顾问还专程拜访了日军前线指挥官。当军事部大臣和最高顾问来到靖安第一师师部的时候，师长山崎积举行了丰盛的前线宴会，并绘声绘色地汇报了靖安第一师幕后的“光辉形象”。

第二天早上8点，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上将和最高顾问楠本中将，在师长山崎积陪同下，登上平顶山高地，守卫高地的日系连长向大臣和顾问报告了布防情况。当最高顾问满意地拿着望远镜眺望大河彼岸苏军阵地的时候，跟随日系连长的勤务兵忽然拔出藏在腰间的手枪，对准楠本前胸连击两枪。可惜，第一颗子弹穿透他上衣袋里的钢笔杆后，被厚厚的笔记本所阻，没有伤着肉体；第二颗子弹擦身而过，也没有击中楠本，当这个士兵正要击发第三颗子弹的时候，楠本的警戒人员惊魂未定地向刺客扑去。行刺的战士飞奔下山，跃入大江，在骇浪中时隐时现地向对岸（苏方）游去……当一阵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江心之后，那名士兵的身躯再也没有浮出水面。由于楠本强烈要求得到他的尸体，日系连长派人到大江下游寻找多日，始终没有发现那名英勇士兵的踪影。

这一对“光辉形象”有力讽刺的谋刺事件发生后，邢士廉和楠本不得不中止了视察计划，于当日乘车回到长春。军事部

各科、课及司长以上军官都到车站迎接，给大臣、顾问及随行人员压惊。

事后，根据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的指示，把平顶山防卫连的连、排、班长和有关士兵逮捕，押送佳木斯宪兵团受审。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人事顾问藤田找我立案，提出靖安师的人事处理意见。当时我想，一个士兵肇事竟扩展到整个靖安师的人事问题，实在非同小可。如果再往上联系，我这个人事课长也责不容辞。于是，我对人事顾问说：

“我认为这一案件的处理，不仅属于人事行政问题，而且关系到军事法律问题。目前我对靖安师谁与谋刺事件有关尚不了解，要马上提出人事行政处理方案是不恰当的。”

人事顾问同意了我的意见。在案件没有查实以前，暂不提人事处理方案。

第三天，在人事顾问主持下，召开了有各司长、人事课长、官房长及长春宪兵司令部一名科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佳木斯日本宪兵团和七军宪兵团负责对平顶山谋杀案进行详细调查。

时隔一月，人事顾问藤田少将通知我：平顶山谋刺事件涉嫌人员已由宪兵团处理。受行政处分的有七军区司令官赫慕侠、靖安师长山崎积；其团、营长以下军官的处理由新任七军区司令官负责，并命令我马上立案。我经过考虑，立案如下：

给予七军区中将司令官赫慕侠停职一年处分，停职期间由三军区中将司令官吕衡充任；三军区司令官遗缺由军事部中将部附赵秋航接替。

给予靖安第一师少将师长山崎积记大过一次、停职一年处分，停职期间由军事部军政少将司司长秋山善任师长职务，司长遗缺由军务科长兼任。

给予团、营长撤职处分，团、营长职务由团、营附暂代。

立案之后，我拿着文本请真井次长审阅盖章，然后拿到人事顾问处通过。

人事顾问藤田看过立案文本笑着对我说：

“肖课长，我认为赫司令的惩罚过重了，应改为停职半年；山崎积师长的处分过轻了，应予免职处分。其他我无异议。”

我说：“山崎积是一师之长，对事件负有重要责任，按理应予免职。但我考虑他过去任劳任怨，在‘剿匪’中有功，所以从轻处理了……”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藤田摇了摇头。“你考虑山崎积是日系高级军官，怕得罪了他将来对你自己不利——对不对？”

“对……”我低下了头：“我还担心山崎积师长处罚过重，顾问您会不高兴……”

藤田点点头说：“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当人事课长的难就难在这里，不过你要记住，在我任人事顾问期间，请你不要再这样思前顾后，今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谢谢顾问的关怀。”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如镜。因为在处理赤峰第八旅两名青年军官的问题上，我已经领教过他们的“大公无私”了。日本官和中国官实际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假如不能权衡这一厉害关系，我这个人事课长恐怕早已被免职或关进监狱了。

日本宪兵队在调查此案时，逮捕了数十名嫌疑犯，逼他们承认是小赵刺杀楠本的同谋。一个与小赵在沈阳同时入伍的士兵供认：小赵曾对他说过：“1935年咱们‘红袖头军’，有一个勇士行刺日本人藤井支队长未遂，被处死。他不愧是一个中国人，他虽死犹荣……”这就是小赵行刺楠本中将的动机。

日本宪兵队经过调查后，对与小赵关系较好的中国班、排

长和 29 名士兵判处死刑或徒刑。

(摘自《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伪满警察机构中的日系头目^①

高丕琨

第一任警务司长 甘粕正彦 甘粕正彦是一个军事特务、政客、浪人。1912 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转为宪兵，升宪兵大尉。在任东京麹町宪兵分队长时，乘 1923 年东京大地震慌乱之机，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 7 岁的儿子全家杀害。事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已才由军事法庭判处甘粕无期徒刑。据说，当时日本某些资本家和反动士绅同情甘粕，捐赠了不少金钱。不久，甘粕被假释，他用这笔款项，到法国留学，学习美术和音乐。回国后参加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侵华活动，为发动“九·一八”事变作了大量工作。曾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代表向溥仪献过殷勤。伪满成立后，充任警务司长，是镇压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刽子手。辞去警务司长后，专管对华劳工问题。于 1936 年出任伪满协和会总务兼企划部长，执掌协和会的大权，配合关东军实行所谓民族协和，为奴役中国人民费尽了心机。1939 年就任了伪满映画会社（电影公司）理事长。他占据了这块文化阵地，从日本聘任内行，编剧本，招演员，加以培养和训练，摄制有关宣扬所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